

# 倾力打造广东报告文学高地

□张培忠

报告文学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体裁。茅盾先生曾说：“每一个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样式，‘报告’是我们这一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自五四以降，报告文学以真人真事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兼具纪实性、及时性与文学性，历经百年蓬勃发展，业已成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魅力的独特文学样式和主流文学体裁。在众多的文学体裁中，报告文学是广东作家展示才华、感悟时代、抒发心声的一方舞台，广东一系列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充盈了中国报告文学的煌煌宝库。继去年重点抓全省长篇小说创作之后，今年重点抓全省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创作，目的是实施广东文学异军突起战略，全面振兴广东文学创作，以报告文学为突破口，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研究以全新的理念、途径、政策和方式扶持优秀作家，以机制、项目、选题、活动等推动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创作，催生更多散文泥土芬芳、闪耀思想光芒的广东故事、湾区故事、中国故事，从而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版图中，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价值、话语权和影响力，以点带面促进广东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 坚定文学自信，从广东报告文学发展历程汲取前进动力

报告文学历来是广东文学创作的强势门类。地处南国的广东，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一大批优秀报告文学作品顺应历史赋予这一文学体裁的光荣使命，不仅记录着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变革，也描绘了英雄人物的重要足迹，洋溢着时代气息、凝铸着时代精神，代表着时代审美，以浓郁的岭南特色、岭南气派、岭南风格，成为广东文学的形象使者。回顾广东报告文学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一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和传承。

一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创造力。广东报告文学最主要的特质是因时而谋、与时俱进。广东报告文学百年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广东百年发展史的缩影。回顾历史，广东文化先驱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即具备报告文学的雏形，为报告文学文体探索作出积极贡献。黄小配的《五日风声》堪称报告文学“啼声之作”，采用浅近的文言文详细地报道了辛亥广州起义的整个过程，于1911年5—6月间在广州《南越报》副刊连载。过去不少文学史家认为报告文学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其实不少描述广东农民运动和重大革命事件的文章，均可视为早期的报告文学。譬如，李春涛《东征纪略》、彭湃《海丰农民报告》既有新闻的真实性，又有文学的形象性，皆为现代无产阶级报告文学的代表作。抗日战争时期，出于报道抗战敌我实况的新闻需要，更为战场的惨烈场景所感动，涌现了丘东平《向敌人腹背进攻》、华嘉《香港之夜》、于逢《溃退》、李育中《缅甸远征记》、杜埃《在呂宋平原》、碧野《滯沱河夜战》等优秀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广东作家善于站在新的高度观察时代的新变化、新事物、新人物，站在新的角度去思考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反映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产生了一批具有广东气派、广东风格的优秀作品。杜埃《沸腾的乡村》、司马文森《汪洋国的女儿》，吴紫风《写在泥地上的诗》，草明《鞍山的人》，秦牧《复员军人杜美宗》，林元《渤海湾的浪潮》，欧阳山、周方场、张涛、关振东《严重的斗争》，林元《访战朝鲜》，黄药农《朝鲜——英雄国度》，黄谷柳《柳友的爱——朝鲜通讯报告集》，何智杰《春春路》，杨冠英、郁茹《阳春三月》，李钟声《囚徒——一个副作家的遭遇》，艾蒲、向明、郭光豹《爱情的凯歌》，陈安先《香港九七回归》，张波《1997，驻军香港》，杨黎光《没有家园的灵魂》《生死一线》，陈启文《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海祭——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等，无不深刻反映了社会进步的必然性和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理性，在不同阶段熠熠生辉、可圈可点。白岚、孙辑六、廖永铭、王伟、陈培学、段雨生《欧阳海》，岑桑、王伟轩《向秀丽》，廖琪《庄世平传》，贺明《蔡廷锴》，涂肖《袁庚传》等作品成功塑造了系列人物形象，为广东文学画廊增添了光彩。

二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行动力。广东报告文学最突出的特质是秉笔直书、知行合一。一方面，承接广东改革开放“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以坚实的文学实践闯出一条新路子，诞生了一系列改革开放题材报告文学作品。洪三泰《中国高第街》记录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和思考，雷铨《中国铁路协奏曲》借助广州铁路局改革折射中国铁路事业的巨大成就。李士非《热血男儿》以深圳蛇口探索“试管经济”展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历史，陈俊年《“太爷鸡”与探索者》率先反映民营企业发展历程。林雨勋、郭洪义《天地男儿》以深圳南山岭的变化折射出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农村走向城市化的巨变。陈秉安、胡戈、梁兆松等《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通过采访200多人在深圳十多年的坎坷经历，反映了经

济特区崛起真实过程。吕雷、赵洪《国运——南方记事》讲述广东一大批改革先驱的故事，全面记录了广东改革开放的艰难起步和辉煌成就。曾平标《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以恢弘的视角记述粤港澳三地合作共筑中国桥的精彩故事，生动展示激荡人心的创造奇迹、创业英雄和创新故事。另一方面，秉承“为民请命”的品格，在种种严峻考验中迎难而上，主动深入第一线，推出大量体现关怀、鼓舞士气、振奋民心的优秀作品。譬如面对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8年的雨雪冰冻灾害、2008年和2010年两次抗震救灾，涌现了33位作家集体创作的《守护生命》，杨黎光《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张积慧《护士长日记——写在抗非典的日子里》，伊始、郭玉山、杨克、温远辉《冰点燃烧》，廖琪、张建渝、温远辉、熊育群、邱超祥、姚中才、陈宇《感动——广东人民支援汶川、陇南地震灾区纪实》等优秀作品。特别是面对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广东作家闻令而动，迅速组织采写驰援湖北的医疗工作者，张培忠、许锋《千里驰援》，熊育群《守护苍生》等作品，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和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发挥了报告文学在思想上解惑、文化上解渴、心理上解压的独特作用，树立了广东文学的良好形象，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三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融合力。广东报告文学最鲜明的特质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一方面，作家跨区域融合，携手书写广东传奇，省外作家或独立创作、或联袂广东作家推出广东重大题材报告文学作品，取得丰硕成果。譬如张胜友《珠江故事：东方的觉醒》讲述珠江三角洲高速发展的辉煌成就，李春雷《木棉花开——任仲夷在广东》描述任仲夷在珠三角期间坚定无私地推进改革开放政策的真实故事，蒋巍、徐华《从震撼》刻画了道德模范巴飞的崇高形象，何建明、何初树报告文学《空降农民》讲述全国劳动模范贾东亮的奋斗轨迹，这些都对广东报告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启发、借鉴作用。而《中国治水史诗》由何建明、程贤章牵头，邀请50多位全国知名作家参与写作，以文学的形式展现上下五千年中国主要治水工程概要，以报告文学的交流、融合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另一方面，作品跨媒体传播，扩大社会覆盖面，适应读者需求的变化，突破纸质媒介单一传播的局限，以网络、广播、影视和其他艺术样式，把文学作品及到社会生活，更好地发挥了报告文学的社会功能。不少优秀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电视专题片、网络视频、音频等，广受欢迎。

## 坚守文学理想，正视当前广东报告文学创作存在不足

现阶段，广东已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的重镇。其主要标志：一是成果丰硕、成绩斐然。一大批优秀作家先后摘取国家级文学奖项，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广东报告文学的实力和地位。主要包括中国作协“1977—1980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83—1984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90—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第一至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首届、第五届中国传记文学奖，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特别奖，中宣部第十届、十一届、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特别奖，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等。二是人才辈出、梯队合理。报告文学作家队伍阵容齐整，老中青相结合、梯次分明。采取灵活措施，积极鼓励更多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等加入报告文学创作队伍，根据统计目前全省从事报告文学创作作家达到200多人。聚集了一批有实力、有潜质的“70后”作家，培养、扶持了一批有锐气、有冲劲的“80后”“90后”作家，群体实力在全国均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三是机制创新、阵地拓展。形成常态化、重点选题创作扶持机制，对报告文学的采写出版、宣传推广等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巩固、拓展报刊、网站发表平台，积极探索厚重之作更是凤毛麟角。广东特色题材富矿挖掘不够，全省各地区长篇小说创作不平衡，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广受市场欢迎的作品少之又少。报告文学领军人物较为缺乏，人才队伍建设的任务仍较艰巨。二是“报告”多、“文学”少，艺术探索不足。某种程度上，广东报告文学不缺发现，而是普遍缺少表现。一些好题材缺乏好的表现技巧，文学表现力偏弱，大量作品给人以“似曾相识”的印象。模式化倾向严重。文学创新精神有所欠缺，题材、形式、手段发展不充分，观念、内容、技巧探索滞后。有的作家捕捉题材的“抓功”、调查采访的“跑功”、驾驭文本的“写功”不均衡，能力有待提升。三是重实践、轻总结，理论提升不够。一方面，报告文学创作总体上显现出一种思考的贫困或启迪的单一，缺乏优秀报

告文学应该具有的敏锐、犀利、深刻的哲学品格；另一方面，理论界对报告文学创作实践总结不多、研究不够、推介不力，未能及时发出广东报告文学理论评论强音，全省报告文学创作影响普遍较弱。究其原因：一是学养储备不足。主动学习不够，对文学创作流变不够敏锐，精品意识、创新意识不强。二是生活积累不足。没有真正沉潜到生活的深处，挖掘生活的富矿，只满足于一般性的采风、调研等活动，规划不足，浅尝辄止；没有深入了解各行各业的新进展、新成就、新气象，没有真正认识自己的描写对象，虽面对现实而没有发现现实，制约了报告文学创作题材的拓展。三是艺术水准有待提高。部分长篇小说报告文学话语方式、创作手法较为陈旧，艺术探索创新不够，创作手法较为陈旧；不少报告文学作家既缺乏艺术上的抱负，更缺乏创作上的恒心，作品知名度不高，在社会大众中影响力较弱，导致文学的价值引领力不足。

我们要着眼于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加强统筹协调，对标最好，补短板，强弱项，全力以赴加快振兴全省报告文学创作。

## 肩负文学使命，推动新时代广东报告文学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为广东报告文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契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报告文学是中华民族新史诗的重要载体，可以表达最为厚实的思想情感，承载最为丰富的文化内容，反映最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长期以来，中国作协对广东报告文学创作深切关怀、重视指导、寄予厚望。前段时间，省作协面向全省征集重大现实题材、红色革命题材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创作选题99个，粤港澳大湾区精品创作选题32个。最近，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省作协、暨南大学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成立为契机，以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创作选题签约为起点，广东的报告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创作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不断壮大的广东报告文学方阵厉兵秣马、整装待发，全省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创作进入打造“文学重器”的黄金时代，不久的将来必定迎来一个花果丰硕的丰收期。

一要振奋精神，以正确价值观书写中国故事。《基希及其报告文学》的作者T.巴克指出：“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国内文化思潮多元多样多变特征更加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创作所传达的，是一个社会渴求进步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报告文学作家都应立先立德、为艺先为人，认真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讲政治，对国家大事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用理想信念筑牢精神支柱，努力担负起立心铸魂的文化使命，不断提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根本、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规律的能力，不断提高深刻认识现实、理性分析事物、艺术表现生活的能力，自觉抵制是非不分、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学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人民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认同。要以“敢遣春冰上笔端”的文化自信，以文学的形式演绎时代变迁、反映多彩生活，主动讲好恢弘的中国故事、湾区故事、广东故事，充分挖掘和展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背后的精神意蕴。要以“笔力可独扛”的责任担当，勇于倡导和践行有利于时代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用更多大气磅礴、激励人心的优秀作品，热忱讴歌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奋斗，鼓励人们以辛勤、诚实、创造性的劳动开创更加美好的生活，扶掖、锻造、宣传富有个性化的文学作品，

不断增强广东文学的吸引力、感染力，为广东在新的起点上再创新局提供精神支撑。

二要精益求精，倾力打造重大题材扛鼎之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毋庸置疑，鲜活生动的伟大实践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情感和新的精神导向，值得作家去记录、去表现、去讴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重点规划广东抗疫题材、重大现实题材、改革开放题材、红色革命题材、粤港澳大湾区题材创作，进一步细化选题，包括决战全面小康、决胜脱贫攻坚、庆祝建党100周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乡村振兴、创新驱动、改革开放再出发等，这次签约的选题主要是着眼于这些领域来谋篇布局和组织创作。特别是由省省委宣传部指导、由省作协担纲创作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廉叙事史》，从全省范围内调集了张培忠、王十月、陈启文、曾平标、李焱鑫、何龙、喻季欣、王威廉、姚中才、盛慧、刘鉴、陈枫、黎衡等13名重点作家集中攻关，以通俗历史、百姓故事、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为特色，以老百姓生活变化为立足点，呈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建设、民主法治、文化建设、人民生活、生态环境、科技创新等重要侧面，全景式展现广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程，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深刻展示中国共产党能、中华民族行、社会主义好的岭南壮丽诗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特区建设40周年献礼。广东是报告文学题材大省，题材优势如何转化为创作优势，需要作家的敏锐发现，更需要作家狠下苦功。当年，徐迟先生为了创作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深入中科院数学所研读了陈景润的数学论文，专门学习了《中国古代数学史》、马克思《数学手稿》、华罗庚《堆垒素数论》等，还学习了地质知识和高能物理知识。这才成就了一部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进入新时代，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文学创作领域在不断拓宽、内涵在不断丰富。文学创作的舞台有多大，报告文学作家的视野就需要有多宽，有多广。严格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家，都应该具备思想家的风范，或起码拥有必要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知识准备，需要博闻强记，深入调查，静下心来，耐得住寂寞，心无旁骛，辛勤耕耘，尤其需要克服小富即安的心态、本领恐慌的窘态和粗制滥造的状态，树立雄心壮志，敢于向中国文学的最高峰发起冲击，在深刻反映波澜壮阔的改革现实上下功夫，在生动塑造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上下功夫，在围绕打造精品力作上狠下功夫，以“扛鼎之作”不断标注广东文学水平的新高度。

三要锐意进取，推动广东报告文学出新出彩。当代广东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巨变，充分释放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利好叠加的“双区驱动效应”，充分发挥广州、深圳“双核联动、双翼齐飞”作用，牵引带动“一核”“一带”“一区”在各自跑道上“赛龙夺锦”，发展步伐之快前所未有，社会生活的广阔丰富前所未有，人们精神世界的多姿多彩前所未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也是报告文学最能出新出彩的地方。事实上，早在近百年前，广东报告文学先驱梁启超作为“报章体”新文体成就卓著的实践者，其《新大陆游记》就不同程度地融入政论、诗歌、散文、小说等文体特征，进行了跨文体探索。当代广东报告文学的一些优秀作品，蕴含着深广的生活、深刻的思想，融合新闻的简练、诗歌的跳跃、散文的抒情、小说的布局等精妙于一炉，将报告文学的开放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都给新时代报告文学创作以独特的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明确指出：“当前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文学创作最忌重复、趋同、跟风、扎堆、克隆，一个面孔、一个模式。发展新时期报告文学，要敢于冲破旧模式的藩篱，让聪明才智在创新中竞相展现，艺术灵感在创新中竞相迸发，不断推出新的创意思路、新的题材内容、新的表现手法，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实现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要积极运用广东特色语言、广东表达方式，大力推进文学观念、内容形式、风格流派、题材体裁、手段方法的积极创新，对时代精神、时代脉动作出精彩的文化表达，展现人们寻梦的理想，讴歌人们追梦的奋斗，富于创造性地讲好抗疫的故事、人民的故事、时代的故事、广东的故事，彰显中国精神，体现中国担当。

“鹏程万里终当奋”。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广东文学创作恰逢其时；2020年又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地改变世界，也必将深刻地影响文学。我们要敏锐把握形势变化，始终挺立时代潮头，用艺术的眼光捕捉现实发展趋势，用文学的笔力激发创新创造，以报告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回答好时代之问，加快推动广东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努力实现广东文学异军突起、繁荣发展、走在前列！



# 用中国美学话语揭示中国文学特性

——评霍俊国《情性为本：王国维文学观念研究》 □冯光

《原道》里，就把孔子“熔铸六经”的为文之道概括为：“雕琢情性，组织辞令”。在解说诗的定义时说：“诗者，持也，持人之情性”（《明诗》）。在《体性》篇中说：“然才有庸俗，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冶所凝”，“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把作家内在创作能力和动因视为“情性”所熔铸。《采药篇》言“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生于情性”，把文学作品中的绚丽描绘的本根归于情性。而“情性”在《文心雕龙》里，因为刘勰以骈文架构为文，或作“性情”，在第二篇《征圣》开始言孔子文章“陶冶性情”，在第三篇《宗经》说，六经“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在《情采》篇中则言：“研味李老，则文质附乎性情”。

而到了研读严羽《沧浪诗话》时，我们又发现严羽在总论诗歌时，特别突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讲过的“情性”二字。严羽说：“诗人，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理学兴起引导文学理论和美学对文学艺术现象形态进行有关学的

致思概括。这里把诗定义为“吟咏情性”的理论论述，一方面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思想，同时又作为一个肯定性命命题和思考文学问题的逻辑前提来对待。黄庭坚也说过：“诗人之心性情性也”，可见“情性”作为诗的本体性表述话语在当时是流行的。

是是可以将中国美学的本体界定为情性本体，我们认为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著名美学家李泽厚长期的研究结果是中国艺术和美学是情本体，这是众所周知的论述。我们认为，在宋代已经开始建构起对自然、人类、社会以及意识、道德、审美等的知识体系之时，从《文心雕龙》到宋代诗话已然提出“情性”作为文学艺术和美学的核心话语，仅仅讲情本体可能不能完善地解释和把握中国美学的核心问题，不能准确地表述美学的中国话语。这个工作可以从多方面进行，特别是应该深入全面地研究宋代美学思想，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宋代文化思想的建构形成了总体性的中国文化思想，其影响广泛深远，文学理论和美学肯定不能例外。

当然，研究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的本体论思想的工作仍然可以有多种选择。霍俊国在本书

想。这种扎实的学风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就此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文论关于文学性的认识。文学性是现代西方文论关于文学特性认识的关键性概念，我们当然可以用西方关于文学性的理论表述等去揭示中国文学的特性，但是更应该做的工作是发现和探索中国传统文论美学是如何揭示和表述文学特性的，找出一种具有中国思维特色的中国美学话语。汤一介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也许正处一个伟大复兴的前夜。当一个民族处在一个伟大复兴的前夜，她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从中吸取力量，反本开新。”本书的主要章节研究了王国维关于人生艺术化境界、内在情性的客观化的诗性话语结构和道艺为一的“不隔”境界等，都对《人间词话》里潜沉的中国诗性理论话语做了深度解读，也为当下建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提供了可以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文论遗产。

本书在结尾引述了我此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的话：“我们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要走出以西格中的研究方法，不能把西方文论思维方式作为解读全球文学理论的普遍工具。西方理论思维模式并不是人类惟一的思维模式，人类在西方思维模式之外实际上存在着多种思维方式、理论模式。人类有多少存在的可能性，就会有多少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也可以走自己的道路。”

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而且认为霍俊国在本书中的探究正是这种值得鼓励的努力。